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梁容若撰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藝文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初版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平裝全一冊

定價一元整

著作者 梁若容

發行者 藝文印書館

總公司：臺北縣板橋市校前街一四號
分公司：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三三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九六九號
郵政劃撥帳戶九六〇一號

印刷者 藝文印書館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公司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字號爲內版臺業字第〇〇六〇號

版權不准印翻

洪序

我國由於幅員大，人口多，歷史長，文化深，因此早就成爲外國人仰慕研究的對象。

歐美人所謂「遠東學」，所謂“*Sinology*”，十七八世紀以後，逐漸發展，分門別目，代代相傳，著作繁多。到了現代，如法國的伯希和、馬伯樂，瑞典的高本漢等人，他們的業績，居然和我國第一流學人分庭抗禮了。然而講到外國人研究我國學術，憑藉的深厚，人才的衆多，讀書的普遍，鑽研的深入，還要推日本人居上。撇開徐福等傳說不論，皇子稚郎子開始從王仁讀論語，吸收中國文化，事在晉武帝太康六年（西元二一八五年），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六百八十七年了。從此以後，漢學在日本，越來越普及，越來越深入。

隋唐以後，凡是我國的重要學派和各種藝術，遲速不等，總要在日本複演一次。明治維新以後，中國哲學、文學、語言學、史學、考古學等學科，在公私立各大學，專設講座的頗多，漢學的研究，更趨於專門化。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全國化爲火海，而珍藏中國典籍的圖書館，如東京的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京都的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因防空疏散得法，可說全無損失。專門的漢學者們也並未改業。戰後二十七年，日本仍成

爲外人研究我國學術的重心；分析近年臺灣大量翻印古書的國外銷售去向，情勢就很明顯了。

日本人的漢籍校勘工作，在清朝乾嘉時代就引起我國學者注意，如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是其一例。賴山陽用漢文寫的日本外史，清末有三種翻印本，編清史稿藝文志的至於誤認爲華人著作。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學術志，介紹日本的漢學著作，更引起不少人注意。民國以後，參考日本漢學者著作的學人更多，翻譯的日本漢學者著作，也常常出現。如鹽谷溫、宇野哲人、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所著書，都在我國相當流行。但是，一部系統總合的日本漢學史，在我國尚未出現。這因爲國學者多數不能通讀大正以後的日文，精通日文的人又未必有高深的國學修養。漢文筆談，漢詩唱和，是達不到高級學術交流的。

老友梁容若兄於民國十七年畢業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後，東渡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深造，潛心於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至今四十餘年，尤精通日本漢學研究的情況，最近集其散見於各刊物的近作，爲「現代日本漢學研究」一書，以便學者參考。處此亟需知彼知己的年頭，可以說是有內容的出版物。

這本書雖僅有十篇文章，包羅卻很廣泛；鳥瞰全局的如「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能夠提要鈎玄，舉重若輕，給我們一個綜合理解，批評比較的地方也平實而近乎客觀。「評神谷正男博士產語研究」「評小松原濤著陳元賓研究」兩短文，可見評者對於這些課題的深入研討。原著者是小題大作，「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評者需要相當的功力，才可以談拾遺補闕，論定千古，莫逆於心。「評諸橋轍次博士著大漢和辭典」一篇長文，大概是這部劃時代的十三卷名著問世以來，最嚴正而有益的書評了。胡適之先生說：「爲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一部小小的書，在淵博與深入兩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對於我國的國學界，扶桑的漢學界，乃至世界的漢學界，都不失爲一部可讀而有啓示性的書。

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系前主任教授吉川幸次郎博士曾經評梁君所著中國文化東漸研究一書說：「這著作在中國是破天荒的，敘述的精密，能充分利用日本研究，並且能補正缺陷……畢竟真正的鄰人意識逐漸高起來，在遠東和平上也是可喜的」（收入閑情賦六十四頁）。我想這些話可以借來批評本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屈萬里先生著「產語的著者問題」一文說：「梁容若先生認爲產語中有些故事是從明清人的著作中採

來的，他從樂施篇講竹節木節的一段話，推證產語的作者應該讀過劉基的尙節亭記。他認為臯賓換瘤子的故事，是出於明清的笑話書。尤其重要的，是臯賓篇所載梁人有畜貓者的故事，是出於明朝劉元卿所作應諧錄中的貓號篇，這可說是鐵案如山的證據，足以證明產語的著成時代，不會早到明朝以前」（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二卷第一期）。節錄中日兩位最篤實博雅的學人的評語，我不必再說什麼，本書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九日 洪炎秋

荆門居士序

張橫渠有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大哉言乎，史冊中國士純儒，未有不以斡旋氣運爲已任者也。余友梁子容若，弱冠蜚聲於庠序。年二十七，以文法校讐之學教授於河北大學。其師楊樹達氏激賞，以爲好學深思，能傳所學者。僅一年捨去，走濟南創民衆週刊民衆教育月刊，居祝甸鄉爲農民師，與國內言村治平民教育者相于喁，以爲有教無類，化民成俗，可以泯階級謀郅治也。業此者三載。繼而負笈東瀛，重治文史之學，而於中外語文比較，庶民教育工具方法之革新，研討尤勤。歸國後以國語運動史、文學史、目錄學等科目教授於北平臺灣各大學者，垂三十年，著書滿家，博洽稱名師。其來臺後創辦之國語日報，於溝通國族意志，增進教育效率，貢獻甚多。識者謂以語同音助書同文，乃建民國進大同之基礎工作。更復出其緒餘，以治中日文化交通史及日本漢學史，爲中國文化東漸研究、爲現代日本漢學研究等書，輒能以我國典籍，正扶桑碩儒之訛誤，以東土秘笈，資禹域學人之博聞。高瞻遠矚，語重心長。每一篇成，遐邇同欽。在昔劉子政馬貴與之博通，未窺海外之書；陳玄

奘嚴又陵之穎秀，或疏流略之學。盱衡古今，尙論華洋，以求真求是之用心，展用夏變夷之雄圖，善善從長，清明如鏡，忠信篤敬，以修身者治學；慎思明辨，以稽古者通今。知言君子，蓋必有取乎此矣。予與君爲兄弟交者四十餘年，重之以婚姻，結之以患難，師友多同，出處相近。賞奇析疑，樂共晨夕。君退休以來，雖著書授讀如常，而時有老驥伏櫪之慨，予輒以四時之運慰之。夫學問之成否，功名之得失，事業之進退，有天有人。君子之所以自處，惟盡其在我而已。以君之身世，方之飄蕭白髮，坎坷不偶者，其遇蓋亦隆矣。今以望七之年，耳目未衰，爽朗健步，方作壯遊世界之圖，若不知老之將至者，豈非有其自信並不得已者乎。三原老人之詩云：「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以君之丹誠磨鍊，固堪千刼。予序君「作家與作品」「南海隨筆」兩書，惟勉以名山之業。今序此書，蓋其最後者，而予亦垂垂老矣。嗚呼！士之莊敬自強，著書立言之外，猶有可爲者乎，則君自此遠矣。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荆門居士序於臺中市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目次

洪序

荆門居士序

一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二 中國歷代佚亡典籍的總合觀察

三 千七百年來日本的論語研究

四 評諸橋轍次博士著大漢和辭典

五 評神谷正男博士著產語研究

六 評小松原濤著陳元贊研究

七 陳元贊評傳

八 評平凡社編東洋歷史大辭典

九 森立之與經籍訪古誌

十 章太炎梁任公胡適之三家書的日譯

十一 附錄

- | | |
|------------------------------------|-----|
| 1. 中國文化東漸研究例言 | 一八七 |
| 2. 中國文化東漸研究序 <small>高明</small> | 一八九 |
| 3. 「中國文化東漸研究」評介 <small>陳固亭</small> | 一九〇 |
| 4. 「漢學東漸叢考」序 <small>壽普暄</small> | 一九六 |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梁容若撰

一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日本所謂漢學，普通泛指我國的學術。有一個時期，和洋學（歐美學問，最初稱蘭學，主由荷蘭人輸入）國學（和學，即日本學）並列。後來也用以翻譯歐美人所謂“Sinology”，也稱爲「支那學」。到現在，東京大學、廣島大學、高知大學等，還有支那學會的名字。有一個「中國四國支那學會」，就是廣島、愛媛、天理、香川、岡山各大學共同組織的。會址設在東京湯島聖堂（孔子廟）的中國學會，是日本研究中國哲學文學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大同組合，出版有「中國學報」十多冊。山口大學、九州大學也有中國學會的組織。此外以研究東洋史（主要指中國史）爲中心的人士，組織有東方學會、東洋學會等社團，那是承襲了歐洲人的觀念，以中國爲遠東，把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國情的學問，稱爲東方學（Orientalogy）。早稻田大學，組織有「東洋文學會」，實際所指是中國文學。東京教育大學出有「漢文學會會報」，東京日本大學出有「漢學研究」，福田大學也有「漢文

學會」，可見傳統的漢學名稱，同時在流行（註一）。從較長遠較習慣的用語看，如「漢人」、「漢字」、「漢藥」之例，用漢學統指日本對我國學術文化的研究，並無不可。我所以不用「中國學」的名稱，因為本篇重心是在學術方面，現代國勢調查一類情報工作，就是日本朝野「支那通」所作的業績，雖然和漢學研究，息息相關，我因為沒有充分注意，就不免疏略了。

一 戰後漢學研究大勢

在中日戰爭前後，日本人因為經營大陸，中國語文學習，國情學術研究，一度成為熱門學問。僑居過中國若干年，在中國完成了中學大學教育的青年，也有相當數目。敗戰以後，這些人相率歸國，利用他們已有的中國語文基礎，轉向於學術研究，是極容易有成就的。固有各大學的東洋史，中國哲文學系，因為得到這些青年的支持，免於冷落。原有的漢學研究機構，也因為得到生力軍而充實，其社會支持層轉趨雄厚。戰後私立大學大量增加，據文部省全國大學一覽統計、一九六三年共有五百九十一所，（計大學二七〇，短期大學三一，國立大學七二，公立三四，私立一六四，有研究所者一〇

三），設有中國哲學文學語言歷史科目的，國立大學七十多所裏有六十所。有中國語文講座的就更多了。所以知名的漢學者，決沒有失業改業的，漢學書較戰前更有廣大的讀者層。通俗著作如吉川幸次郎、三好達治合編的「新唐詩選」（岩波書店版），據出版新聞社調查，一九五二年一年賣到十六萬冊，成爲全國暢銷書的一種。印滿精美圖版的圖解中國文化史大系（誠文堂新光社）、圖說東洋文化史大系、東洋美術史大系、東亞考古學大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新釋漢文大系（明治書院）、中國詩人選集（三十三卷，岩波書店版）、漢詩大系（全二十四卷，集英社版）、東洋文庫（東京平凡社）、中國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東洋陶磁全集（東京平凡社）等書的陸續出版，都可見漢學的普及化通俗化，成爲一般國民的文化教養，決不僅是少數人抱殘守缺，玩弄古董的存在。看看「亞細亞歷史大事典」，「大漢和辭典」等規模宏偉的工具書，更可明瞭他們的紮實工夫，悠久努力。

據一九六一年的「日本中國學會會員錄」，共有會員六百六十三人，分析他們的職業，幾乎都是專門以上學校的漢學教師。另外研究中國史的人們，組織有東方學會、東洋學會、人數要比中國學會爲多。提倡重儒尊孔的學者，組織有斯文會，許多年以湯島

聖堂爲活動中心，每年四月祭孔子，十一月祭先儒。據一九六一年會員錄有四百七十五人。和中國學會的會員頗多重複的。此外有中國研究所一派人，多作現代中國情報調查等工作，和外務省情報人員，各自有其觀點與方法。估計專門研究中國學術國情，能著書譯書寫各種文章的，大約在二千人左右。漢學研究最重要的重心是東京大學，就是以前的東京帝國大學，地點在東京本鄉區。東京大學從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就設有古典講習科，承襲傳統漢學研究的系統，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改稱漢文科，是文史哲並包的。以後東洋史分出獨立（日本中等教育設東洋史科目始於一八九四年），考古語言等講座也陸續分立。前後領導學風的重要教授，哲文方面有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鹽谷溫、高田貞治、加藤常賢、倉石武四郎等。東洋史方面有白鳥庫吉、那珂通世、市村瓊次郎、箭內亘、加藤繁、池內宏、和田清等。現任的教授，中國哲學有宇野精一、阿部吉雄、文學有小野忍、前野直彬、工藤篁，語言文字有藤堂明保，東洋史有榎一雄、周藤吉之、江上波夫，考古學有駒井和愛、關野雄。講座的數目實在寥寥可數，可是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擁有極豐富的圖書資料，另有其編制經費，事實上成爲東京大學的上層研究機構，教授研究生兼任交流，規模聲勢就壯大多了。東洋文化研究所，就

是東方文化研究院東京研究所的後身，成立於一九二一九年（民國十八年），由服部宇之吉、瀧精一、仁井田陞等先後主持，現藏書達二十一萬冊，出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已刊行至二十五冊。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註考證」，即由該所出版。遍佈全國的日本漢學者，大部分出身於東京大學。他們的學校刊物，「史學雜誌」創刊於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漢學會雜誌」創刊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另一個漢學中心是京都大學，京都大學的文科，創始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主要教授大部分是由東京聘去，或從東大出身。文學方面的名講座有過狩野直善、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哲學方面有過高瀨武次郎、武內義雄，東洋史方面有過藤田豐八、內藤虎次郎、桑原隱藏、小川琢治、羽田亨、那波利貞、考古學方面有過濱田耕作、梅原末治等。現任的教授，中國哲學有重澤俊郎、湯淺幸孫，文學方面有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平岡武夫、清水茂、田中謙二，東洋史方面有宮崎市定、田村實造、佐伯富、貝塚茂樹、森鹿三、岩村忍、藪內清、羽田明等，考古學方面有長廣敏雄、水野精一。京都大學附設有人文科學研究所，就是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的改名，自有編制和經費，擁有二十三萬冊的圖書，事實上也等於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部。京大的「東洋史研究」季刊，創

刊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現仍在繼續發行。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室則出有「中國文學報」，已出有二十多冊，要算日本研究中國文學最充實的刊物。總合比較東大和京大的學風，大約東大較恢宏，較現實，努力於找新材料，迎接新風氣，政治氣氛始終濃厚，京大較紮實，研究深入而合作，看法比較長遠而超然。求真求是的意味為多。

除了以上兩個漢學研究中心以外，東京的教育大學（以前的東京高師，東京文理科大學），仙台的東北大學、福岡的九州大學、廣島大學（以前的廣島高師）、東京的私立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明治大學、國學院大學、大東文化學院，京都的龍谷大學，大谷大學，也都有悠久的漢學研究歷史，蒐羅保存可觀的典籍，聘請過不少著名講座，訓練過一部分漢學人才。近年來北海道大學、名古屋大學、神戶大學、大阪大學、大阪市立大學、橫濱市立大學、東京市立大學、東京法政大學、慶應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二松學舍大學、日本大學、一橋大學、京都同志社大學、福井大學、高知大學、山口大學、岡山大學、德島大學等處，都有關於中國學術的書刊出版，可見風起雲湧，新人輩出，機構叢生的一斑了。

戰前除了公私立大學的少數中國哲文，東洋史講座以外，用經濟力鼓勵支持中國學